

情炽火焰山

李显坤



火焰山真是名不虚传,酷热令人难当。杨教授自北京来,我陪他来火焰山。一大早从克拉玛依出发,到这时恰是正午。按照杨教授的意愿,进了吐鲁番盆地,先未去别的景点,直达这里。一下车,就随那满脸汗的杨教授说了句:“想那吴承恩当年在淮安写《西游记》,充其量上到东海之滨连云港的花果山,那时又不是信息时代,他怎会知道这万里之遥的火焰山呢?真是神奇!”但从他左顾右盼的神情来看,兴致极高。

新疆地域辽阔,景点间的距离不能和江南相比,一路行程一路大漠风光,才进入绿洲便又来到了火焰山。视觉的变幻,不可谓不大。这火焰山的山峰并不是很高,与陕北的塬或梁一样。长期的风在整座山上形成了一层层的线条,直观这山势,似是一层层的岩石,细看却又像极了一层层的沙。天空湛蓝,不见一点云彩,好像一块蓝布罩在了山顶,似乎火焰山就是被这沉重的蓝压低的。阳光变成了一道道白炽的锋芒,直往人们裸露于外的每一寸皮肤里扎。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写道:“西方路上有个斯哈哩国,乃日落之处,俗呼‘天尽头’,这里有座火焰山,无春无夏,四季皆热,那火焰山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袋、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哩!”杨教授说,昨晚他又翻下了《西游记》中的这段话,来到山下更增加了对火焰山的印象。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遇阻火焰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扇灭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山。今天前来,连把扇子都忘了拿。不过就这样的高温,扇子也没有什么用的。

时节正在7月中,我们抬头看,景区巨型金箍棒温度计测得地表温度为67℃。镌刻有“火焰山”三个大字的石碑上的字更加火红,几只做道具的骆驼也是懒洋洋的,烈日当头晃得人睁不开眼,周围的一片

红色更让人感觉已经置身于火海之中了。

《西游记》中所描写的火焰山虽显夸张,但高温和寸草不生这些基本特征,与火焰山实际情况基本符合。此刻火焰山一片火红,山体的泥土在强烈日光的反射下,似乎是刚出炉的炭火,热浪滚滚,绛红色烟云蒸腾缭绕,热气流不断上升,红色沙土熠熠发光,恰似团团烈焰在燃烧。这样的山当然是光秃秃的,难怪在隋唐时期,便被称之为“赤石山”,当地人也一直称其为“火山”。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第一次经过火焰山时,是在严冬,所作《经火山》诗,描述的也是炎热:“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烧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

导游体贴地对一名撑着阳伞不堪高温的老年女游客说,如果忍耐不了,拍个照就上车等着去下一个景点。而对年轻一些的游客,则说要带领他们去体验被烤焦的滋味。一名游客接过话头:“再热我也要转一转,千里迢迢赶来,并不是为了和这块石碑合影。”

火焰吐鲁番是我国最炎热的区域,火焰山更甚,这里的高温简直能够熔断人的思维。山下的广场上有几尊铜塑像,唐僧师徒四人之外,当然还得有铁扇公主、牛魔王及其坐骑避水金鼈兽。似乎他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炎热,在那里纹丝不动。人们却不敢轻易出手去触摸,个个都像刚出炼丹炉的孙悟空。火焰山的坡上有直通山顶的爬梯,但在这样的高温下,导游劝阻着意欲攀爬火焰山的游人,半真半假地说,曾经有几个游客在这样的时间去攀爬,后来被火焰山烤熟了。

当然这里有坐滑翔机看山的项目,今天却不巧,滑翔机在维修。

在红色的火焰山旁,起初我看到山脚下

有一道深沟,沟底下流着一股水,水流不大,但很清冽。这里的水源在何处?沟底长有许多绿树,远看杨树居多,其他树木不好辨认。变换一处角度,远处的盆谷已形成了一条狭长的绿洲,与火焰山荒山秃岭形成强烈对比。一时山峰盆谷红绿相衬,色彩极其鲜艳。导游说火焰山下这样的河谷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葡萄沟等。

这说明,高温难耐的火焰山山体之下,定是一个天然的地下水库。正是由于火焰山居中阻挡了由戈壁砾石带下渗的地下水,致使潜水位抬高,在山体北缘形成了一个潜水溢出带,从而在更远处滋润了鄯善、连木沁、苏巴什等数块绿洲,一举养育了一方生灵。这里出产的无核葡萄名冠全世界,生长的西瓜又沙又甜,周边还出产极负盛名的哈密瓜。

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在这里世代居住的人们,对水源有异乎寻常的感知,因之发掘并使用了坎儿井来灌溉田园。吐鲁番盆地虽终年高温,这里的人们却大量种植适于高温地带生长的长绒棉。秋天,株高似树从般的棵棵棉秆上结满了白花花的棉絮,顷刻把一片火州的土地平铺成了雪原。

这就使得吐鲁番这个坐落在红色群山环抱之中的盆地,成为一个令人非常向往的地方。

汪曾祺也来过火焰山:“靠近火焰山时,发现戈壁长上了一些从翠绿翠绿的梭梭。这样一个无雨的、酷热的戈壁怎么会长出梭梭来呢?而且是这样的绿!不知它是本来就是这样绿,还是通红的山把它衬得更绿了。大概在干旱的戈壁,凡能发绿的植物,都罄其生命,拼命地绿。”

在汪曾祺的眼中,火焰山整个山,就像一场正在燃烧的大火,火之颜色、形态无不具,真是一个奇观。我相信汪曾祺对火焰山是作过一番考证的,不然他不会定论,火焰山大概是火手笔的杰作。

火焰山实在是热,呆不住,在这里的游玩时间比较短,40分钟左右就结束了。一到车边我们就切了个西瓜,旁边的游客们起初很羡慕。但很快就发现一个坡面上立了个很大的遮阳棚,棚里摆满了西瓜,有的西瓜已被切成了很均匀的块,鲜红诱人,虽一块

叫价三元,但切开的一堆西瓜,一会儿就告罄。西瓜摊前有一堆沙,沙堆里埋了很多鸡蛋,有的露在外面。这令南方来的客人格外惊奇,在沙里能够烤熟鸡蛋,味道一定别有不同,这样的鸡蛋也很抢手。更多的人在离去前匆忙照相,这酷热难耐的美景,别处更没有。

离去前,杨教授一度长久地凝望火焰山,也许联想起了什么,只听他深有感触地说:“今天虽没有登山,但看到山下的绿洲,感觉人类的力量真是伟大。我相信,只要肯努力,这世上还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啊!”



书法 王树秋

1982年天津市出版局创办《天津书刊》报时,因局机关是管理机构,办报没经费,便将报纸临时派给了图书发行单位天津市新华书店。当时是由出版局出面协调局出版和天津各家出版社组成编委会,编委会同新华书店从出版系统物色人员组建编辑部,印刷、发行等经营业务则由新华书店负责。因此我被调到编辑部的最初两年,是在哈尔滨道中国大戏院对面的天津市新华书店办公楼里工作的。记得那时书店老职工聚在一起经常会说,谁谁是“新华”,谁谁是“三联”,谁谁是“中图”,谁谁是“国际书店”或“知识书店”的。这让我很感好奇,新华书店人员的来历怎么这么混杂。这个疑问曾伴随我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参与编纂《天津出版志》时,看到了天津市新华书店的档案资料,方才明了内中缘由。

据当时的各种原始档案记载,截至1949年1月上旬,天津共有各类大小私营书店和书摊72家,其中38家集中在天津市场,其余多散落在劝业场、南市、大胡同一带。他们所经营的书籍,大多为古旧书、外文书和国统区出版物,极少数偷卖解放区读物。1月15日红旗插上天津城后,当时代表新生人民政府批发、销售新书的部门,除华北、东北解放区书店及三联书店相继在津开设的新华书店第一、二门市部及新中国书店外,还有此前已由中共天津地下市委领导的知识书店和读者书店,以及稍后出现的国际书店天津分店。

1949年6月,新华书店天津第一、二门市部,按照中央出版委员会的部署,合并成立“新华书店天津分店”。8月,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将在津开办的“新中国书店”,易名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天津分店”。12月,由郭沫若题写店名的新中国最早的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国际书店”在北京成立,旋即便在天津滨江道老“庸报”馆旧址开设“中国国际书店天津分店”(简称“国际书店”),专门销售苏联出版的中文书刊及各种外文出版物、唱片、艺术画片等。1950年5月1日,根据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的指示,读者书店与知识书店合并,仍以“知识书店”的店名出版发行新书。1951年7月,遵照出版总署的指示,三联书店天津分店与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中华书局天津分局、开明书店天津分店合并,成立“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天津分公司”(总公司1951年元旦在北京创办,简称“中图”),并在大胡同“商务”原址与和平路“开明”原址设立门市部,同时在滨江道光明影院旁开办期刊门市部。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上胡愈之署长代表中央提出了出版业专业分工的总方针,要求各地的图书出版、印刷、发行业务要实行专业化,各司其职独立经营。根据会议精神,1952年7月,中共天津市委决定“知识书店”发行部并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与此同时,“中国国际书店天津分店”也按照出版总署指示划归“新华书店天津分店”,改建为“新华书店外文门市部”。1953年12月12日出版总署再次发出指示,决定自转年起,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并入新华书店。于是1954年1月2日,在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季翘、赵步崇的见证下,“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天津分公司”也划归“新华书店天津分店”。

至此,来自津不同系统的国营图书发行人员和发行业务系统统归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使之成为当时天津国营图书发行业务的唯一机构。据店史档案所记,当时天津分店共有职工338人,下设八科(秘书科、人事科、供应科、批发科、计划财务科、计划发行科、课本发行科、宣传推广科),并有直属门市部七处(和平路门市部、科技门市部、滨江道门市部、大胡同门市部、外文门市部、大沽路门市部及塘沽支店)。此后,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为了便于图书市场管理,文化部下发了《关于改变新华书店体制的通知》。根据其要求,1958年8月18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的隶属关系由原来的新华书店总店划转为天津市文化局,人财物均由地方统管,店名也随之改为“天津市新华书店”。

从『分店』到『书店』

倪斯霆



洁上丛话

第五〇八期

满庭芳

面对诱惑

刘鹏 著

77

进入院中的敌人,没有直接向楼内进攻,而是趴在楼门口台阶下向楼内喊话,劝楼内的人放下武器。唐明安对他们不理不睬,敌人不耐烦了,一阵乱枪打碎“玻璃”,紧接着又扔一颗手榴弹,被炸掉的门框上的一段木头,猛然砸到唐明安头上,使他瞬间昏迷过去。待他醒来时,人已经被绑在受刑架上。案情重大,国民党力行社天津情报组组长陆益民,亲自对唐明安进行审讯。

陆益民一走进审讯室,就假惺惺地称赞唐明安说:“以一人之力竟然掩护了多人撤退,在我的抓捕史上还是第一次遇到,真是英雄勇士!”从陆益民的口中,唐明安知道楼内所有同志都已安全撤离,心中踏实下来。他长嘘了一口气,双目紧闭,不管他陆益民说什么、问什么,就是一个态度——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陆益民是审讯老手,一看唐明安的神态,就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有骨头的硬汉。他没有对唐明安动刑,反而让特务们把唐明安带到一间豪华的卧室中去休息。唐明安一进入卧室,就躺在了床上。陆益民瞧着他,心里想:“看来这个年轻人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既然他不怕死,那就先用金钱、美女引诱他,如果再无动于衷,再枪毙不迟。”

战斗、受伤,在受刑架上被绑,唐明安确实累了,他需要休息,以便养足精神,迎战特务们的酷刑。唐明安睡着了。在梦中,他被一个解他衣扣的人弄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北大燕园的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59

湖心岛上有方亭

由于巧妙地处理好了建筑与山水之间的关系,“后寝”建筑分散而不零乱,体量较大而又不影响湖区风景的和谐。而且,依靠绵延于西部湖岸的湖心岛,将位于东部湖北部的主要校园建筑群遮挡在湖心岛之外,从而保证了湖区风景的完整性。

在以未名湖为核心的“后寝”——燕大生活区内,主要建筑有岛亭、钟亭、临湖轩、一体二体和六斋四院,南北阁与圣人体等。湖心岛上有一座方亭,端庄、美丽。有人说,如果把未名湖上的湖心岛比作明珠,那么岛亭无疑是明珠发出的最耀眼的一束光芒。

这座亭子为木质结构,形制上是一座单檐八角亭,由八根红色的木柱支撑起重檐瓦当和宝塔状的亭顶,整体上给人以敦厚稳重之感。木梁上施有精美的彩绘,色彩艳丽,题材广泛,既有山水风景,又有历史和故事。亭子的底座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八角形石台,外有回廊。从建筑上来说,这座亭子在形制上并没有太多特别的地方,然而“社会关系”上却可以说是“身系古今中外”。

先说古今。岛亭所在的岛即是当年巨霸和坤恩德的“蓬岛瑶台”,他的那口希望永远不沉的舳舻依然系在小岛的东侧,那是耻辱的物证,也是留给历史刻骨铭心的教训。时光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燕京大学要在这里传播基督福音,开展博雅教育。燕园的设计者墨菲,起初把这个小岛设计为“拼贴式”的中国小园——斯克拉顿—鲁斯社会活动岛,然而为了不破不坏风景区的宁静和天然,这里最终只建了这座方亭,亭前辟出一块开阔的空地,作为全校社交和公共活动的中心。那里可以举行包括宗教仪式在内的各种小型聚会,也可做露天课堂。例如燕大国剧社等一些社团的活动就经常在岛上进行。校方曾请来治贝子园的前主人“红豆馆主”何五爷溥侗,在这里讲授选修课。在燕大刚迁入这里的一段日子里,在这里看电影便成为一项常规的娱乐。有一天播放了一部名字叫《淑春园的宝藏》的“神秘电影”,片子开始叙述和描写时,主要宝藏从来没有找到过,因而一直流传着淑春园中有大量宝藏的传说。人们为了寻宝,全都跑遍,甚至连舳舻都被移动了,仍然连影子都没有。一个多世纪以后,“宝藏”出现了,不是和坤的金银财宝,而是“比和坤拥有的珠宝宝玉更珍贵”的“燕京大学”。



30 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1984年秋,叶嘉莹先生应日本的冈村繁教授邀请,赴日本国立九州大学讲学。

冈村繁(1922—2014)先生是中日学界公认的当代日本汉学大家,也是日本汉学界的一位泰斗级学者。1922年7月出生于日本滋贺县,1944年入读广岛文理科大学文学部汉文学专业,师从著名汉学家斯波六郎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学期间,在斯波六郎指导下,冈村先生深受日本“京都学派”严谨学风和中国清代乾嘉学者遗风的熏陶,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

1959年,冈村先生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助教,1962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历任东北大学助教(副教授)、九州大学助教、教授。在九州大学退休后,被九州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后转任久留米大学教授,创建文学部(文学院)并任第一届学部长。冈村先生虽没有到过中国的留学经历,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多次赴中国参加学术研讨会,与许多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卒于2014年12月,享年93岁。2002年,《冈村繁全集》(共11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为一位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出版全集,国学大师王元化先生亲笔作序。在序言中,王元化先生这样写道:“他对中国文化怀有的深厚感情是从他长年累月对中国文化的倾心研究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感情理应受到中国



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 著

人民出版社

学术界的珍珠。”“如果说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并不限于中国自身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视阈也就不能囿于本国范围。就此而言,《冈村繁全集》作为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国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2013年7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一篇驻东京记者站负责人谢宗睿先生采访冈村先生的报道,标题为《日本人血液中的“中国文化”》。记者从一幅中国学者书赠的“汉学泰斗”挂轴开始访谈,冈村先生对此说道:“所谓的‘汉学泰斗’,只不过是,我读中国书的时间比较长罢了。从孩提时代起,我读的中国书就超过日本书。十三岁之前,我读的书全是中国。十二岁进入中学后,学校开设有专门的汉文课程,作为国语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日本,大部分小孩子都从十三岁起开始学习汉文,到了二十岁左右,我们对汉文的理解能力和水平已与中国人不相上下。实际上,在英语、德语、荷兰语等外语传入日本以前,日本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只学习中国的典籍,其中很多人的见解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人。而且,如果没有汉文作为媒介,所谓的‘西学’也就无法迅速地传入日本……”

布满人的身体的很多部位,那种感觉当然不怎么美好,但那就是农耕的记忆。

芒与忙

杨仲凯

说,过了芒种的节气,如果还要进行农耕活动,成活率很低,那干脆就别种了。

芒种节气的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是在前一年深秋时候产卵,转年的芒种时开始被孵化。天气热了,到这时候,螳螂卵破壳生出小螳螂。形容螳螂勇敢的成语是“螳臂当车”,但也是不自量力的表现,还有“螳螂捕蝉,麻雀在后”,看来螳螂虽勇,但不够智慧。

二候鸣鸠鸣。鸠,就是长尾巴、灰色的伯劳鸟,这个时候开始在枝头出现,感阴鸣叫,叫声很凄切。古籍《初学记》里说,伯劳鸟是古人尹吉甫之子伯奇受冤屈死之后的魂魄所化。伯劳鸟能于芒种时一鸣鸣叫到七月。

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就是乌鸫鸟,是一种能学其他鸟叫的鸟,叫声嘹亮声音高。奇怪的是,到了芒种三候,反舌鸟却不叫了。候应是古人通过动物和植物的表现探知气候变化的妙法,但也不一定都准确。

哪一个节气都和天时有关,从春到夏的节气好像都被雨水淋湿。节气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也直接反映农耕文化。芒种当然不可能例外,从这时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很漫长,一般从六月中旬到七月底,整个夏天都是在下雨。芒种时甚至之前也可能进入梅雨季节,那就是“青梅”。梅雨季节的得名,是因为那时正是江南的黄梅成熟季节。梅雨季节潮湿阴郁,梅音音霉,那个时候南方气息,空气都有发霉的味道,所以梅雨也叫“霉雨”,别说南方,北方也可能有长时间的连雨天。抢收和抢种,跟农时有关,跟梅雨季节也有关,时间和机会不会总是等人,人们研究天地之间的规律,就是为了更好地种庄稼,更好地活着。

刚下来的新鲜梅子味道酸涩,直接入口很难吃,加工的方法就是煮梅。“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就是这个时间的事。煮梅用水、加糖,煮过的梅就甜而不涩了。用青梅也可以做青梅酒,但“青梅煮酒”,青梅是青梅,酒是酒。看《三国演义》原文“盘置青梅,一樽煮酒”,青梅只是佐酒之物,而煮酒则是烫酒的意思。

前面提到过二月二花神节,谷雨时已经“二十四番吹遍”,到了芒种日之时,过去还有举行祭祀花神仪式、饯送花神归位的习俗,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芒种节气在农历五月,跟端午节时间差不多,和中秋节叫做“八月节”相对,民间本来就是把端午节叫做“五月节”的。2022年的芒种在五月初八,和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没差几天。时间这么近,所以端午节的很多文化习俗和芒种节气有所重合。

我记得有一年端午节全家自驾出行,也是芒种节气前后,穿村过路时看见很多农人在田地里耕种,记忆的景象是田里的农人弯着腰插秧,都戴着草帽,另一种记忆景象是金色的麦浪有风吹过。我到底看见了什么呢?要不就是我的记忆有所叠加,把几次所见记在了一起,总之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的人,是希望的田野,是每年都会有的农忙时节。

布满人的身体的很多部位,那种感觉当然不怎么美好,但那就是农耕的记忆。